

跨区梯度转移抑或域内产业深化

——基于2003~2013年全国和长三角分区数据的产业转移分析

张明之, 谢 浩

(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3)

摘 要: 本文对2003~2013年的低梯度地区的制造业行业中类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 产业梯度是影响区域产业转移的第一变量。而进一步关于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细化数据显示, 在空间方面, 同梯度地区之间边际产业的域内转移往往强于域外转移; 在时序方面, 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早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在结构方面, 高、低梯度地区因产业转移整体上步入产业结构上升通道, 特别是制造业在高梯度地区呈现明显的逆梯度集聚或转移趋势。为此, 高梯度地区可通过渐次扩大区域经济联系的方式拓展域内产业空间转移范围, 低梯度地区可通过有所侧重地构建地区产业高地的方式为向域内更低梯度地区转移产业积蓄产业势能。

关键词: 产业转移; 长三角; 产业梯度

中图分类号: F0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92(2017)02-0010-08

一、问题的提出与国内研究现状

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第一批次大规模的全球产业转移, 使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相对后发却拥有显著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大量承接来自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边际产业而相继成为新型工业化国家。80年代全球产业转移的重心开始向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等更具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倾斜, 一大批新型经济体应运而生。改革开放至今, 中国特别是长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无疑成为这一波次全球产业转移的最大接受地区。但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 国内供给方面的劳动力、土地成本等比较优势正加速削弱, 需求方面的全球市场持续疲软、动力仍不足, 国内和国际多重因素正加快长三角等先发地区边际产业外移。

关于产业转移的早期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国际产业转移为视角, 经典的产业转移理论主要包括赤松要的“雁阵模型”理论、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1][2]}, 这些理论较为系统地解释了国际产业的梯度性转移趋势, 即边际产业“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渐次转移”的一般规律。

我国学者对产业转移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既有关于我国东部地区对接全球价值链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立足国内价值链转移域内边际产业的模式选择方面的思考^[3], 也有仅以长三角

收稿日期: 2016-08-08

基金项目: 长三角合作与发展共同促进基金资助项目(15CSJ04012)

作者简介: 张明之(1970-), 男, 浙江象山人, 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谢浩(1990-), 男, 安徽合肥人, 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等先发地区内部“中心-边缘”结构为出发点分析上海与浙江、江苏之间“雁行形态”的研究^[4]，而从整个中国经济的非均衡结构出发解读产业转移特别是制造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可能性和现实障碍的研究则主要于2008年之后密集出现^[5]。在早期的研究中，结合我国产业经济发展实际对产业转移进行定性分析的居多，2010年之后的研究更加注重从实证层面对产业转移进行分析。虽然国内学者关于产业转移的研究的起步总体较晚，但从概念界定、影响因子甄选、模型构建、转移效应分析到发展前景展望的讨论和研究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也为本文进一步立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特点研究产业梯度转移的特征和模式等提供了基础。

关于产业转移的概念界定，本文主要引用陈刚(2006)关于产业转移的宏观概括：一定时期内由于区域间产业竞争优势消长转换而导致的产业区位的重新选择的结果，也是产业发展在空间上的重构^[6]。相比较于部分学者狭义地认为产业转移只是产(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部分或全部的迁移，产业生产份额在产业上和区位上的相对消长更能体现产业转移的实际经济意义。基于此，多数研究以赫芬达尔指数、区位熵和产业绝对份额来测度产业转移，但在区域分类、数据口径和时间划分等方面的选择侧重不同，得出的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Wen(2004)、冯根福(2010)等人认为东部地区产业没有转移，刘红光(2011)也指出产业转移并不明显^[7]。杨亚平等(2013)基于对全国大中城市2000~2010年的数据分析，认为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外移趋势明显，而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上表现突出^[5]。陈建军(2007)则强调东部地区内部的产业转移更加明显(如省内转移现象)^[4]。刘红光等(2014)的研究基于2007~2010年省际数据，指出产业转移因为产业的不同呈现不同的产业转移方向、不同的转移模式和不同的转移速度，但总体符合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的规律^[7]。结合新地理经济学的发展，胡安俊和孙久文(2014)在利用三位数制造业细化数据对中国四大地区的“产业转移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认为高替代弹性产业转移先于低替代弹性产业，在转移方式上前者倾向于扩展扩散式转移，后者倾向于等级扩散式转移^[8]。

在产业转移概念方面，本文倾向于陈刚等人关于产业转移的定义，认为广义的产业转移表现为产业生产份额在产业和区位上的相对优势的消长。既然是产业优势的相对性的消长，必然包括边际产业向外扩散的可能性和部分产业在互动过程中进一步集聚的可能性(后者的典型代表可能来自高端制造业及与生产性服务业联系紧密的制造业)。为更真实地反映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情况，一方面，在数据口径上实行渐次收窄，数据处理从制造业21个行业大类逐渐向176个行业中类细化(后者与胡安俊的169个三位数制造业的数据口径基本一致)；另一方面，不再限于现有研究在地理空间上的东部、中部和西部(或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的区域划分方式(因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也非匀质经济结构，区域梯度高低有别)，借鉴钱纳里等人关于工业化进程的划分方法，对我国30个省(市)(除西藏外)进行产业梯度分区，并在关于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分析中进一步深入到对三省一市33个市级地区的梯度分类，以此在更加细化的数据分析中考察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

二、理论基础与基本假设

(一) 产业梯度转移的基本设想与梯度划分

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在国际分工中体现为“中心-外围”的二元结构。中心和外围地区主要通过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分工和经济互动。在经历产业或产品的成熟阶段之后^[2]，“中心”地区的边际产业便会向后发地区“选择性”转移。此后，相关产业在“外围”地区重新经历一个产业(品)生命周期，并逐渐向域内次外围地区“扩散”。产业的区域转移往往遵循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的规律。为此，本文首先对照

霍利斯?钱纳里等(1988)的工业阶段划分标准^[9],根据2010年全国30个省(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将区域经济的产业梯度由高到低分为梯度Ⅰ、Ⅱ和Ⅲ区^①。在理论上,梯度区之间相邻性与地理空间上的毗邻性不相关,如环绕上海等经济中心区的次梯度地区在经济空间上可能是江苏、浙江,也有可能是山东等地。具体划分详见表1所示。

表1 2010年我国主要省(市)的区域梯度划分

经济区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分 布
梯度Ⅰ区	60000元以上	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广东
梯度Ⅱ区	30000~60000元	辽宁、福建、山东、吉林、重庆、湖北、河北、陕西、宁夏、黑龙江、山西
梯度Ⅲ区	30000元以下	新疆、湖南、青海、海南、河南、四川、江西、安徽、广西、内蒙古*

注: *用来说明内蒙古因为资源型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突出位置,在分类处理时对其进行了“降级”处理,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本应在Ⅱ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

假设一:区域经济中心地区的边际产业按照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依次转移,也是区域产业转移的主要趋势。

(二) 产业梯度转移的影响因素

边际产业的梯度转移源于中心或高梯度地区要素成本、市场竞争和产业需求等因素对产业的挤出效应,从而为产业的区域梯度转移创造了供给。因为利润空间不断压缩、市场份额缩小,一部分产业要素转而向更有比较优势的经济空间寻找生存可能。低梯度地区的经济规模、要素成本、人力资本和产业基础等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对不同产业都有吸引力,程度高低可能不同^[10]。成本导向型产业对要素成本更加敏感,市场导向型产业对本地市场和稳定的域外市场的规模大小更加关注。但如何转移、转移量的大小不仅决定于上述几方面,高低梯度之间的区域经济联系强弱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交通运输设施建设状况)^[4]。上述因素在同梯度地区的非均衡性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产业梯度转移的方向和规模。

假设二:经济可达性、产业基础和要素成本等均是区域产业梯度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产业梯度转移的实证分析

(一) 产业转移的测量

国内外研究主要通过赫芬达尔指数、区位熵和产业绝对份额对产业集聚和扩散进行量化测算。鉴于本文关于产业转移的范围的预设(即产业转移主要表现为产业份额在经济空间或产业空间上的变化),我们在产业转移测量上倾向于采用产业相对转移指标,并通过工业总产值的相对份额变化来解释区域产业转移,即

$$Y = y(A_i, t_1) - y(A_i, t_0) = \frac{A_{i,t_1}}{G_{i,t_1}} - \frac{A_{i,t_0}}{G_{i,t_0}} \quad (1)$$

其中, Y 表示 $t_0 - t_1$ 期间 A 地区 i 产业占全国 i 产业总产值比重的变化,以表示在此期间该地区 i 产业的产业转移量,正为转入,负为转出; $y(A_i, t_1)$ 表示 t_1 时间 A 地区 i 产业占全国 i 产业总产值的比重, $y(A_i, t_0)$ 表示 t_0 时间 A 地区 i 产业占全国 i 产业总产值的比重; A_{i,t_1} 和 A_{i,t_0} 分别为 t_1 、 t_0 时间 A 地区 i 产业的工业总产值, G_{i,t_1} 和 G_{i,t_0} 分别表示 t_1 、 t_0 时间全国 i 产业的总产值。表2为根据公式(1)测算的2003~2013年我国高、低梯度地区之间相对产业转移情况。图1显示,2003~2013年梯度Ⅰ区28个

① 鉴于我国的人口统计每五年普查一次,本文采用各省(市)的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除以2010年年末地区人口数量作为区域经济梯度划分的标准。

行业大类中有 21 个行业的产业相对比重为负值(表中的相应节点在 0.00% 以下),表明对应产业比重在该区出现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对应转移在梯度 II、III 区的相对产业比重却呈现相应的上升,且梯度 II 区的产业承接量总体高于梯度 III 区。虽没有细化到将 3 个梯度区在行业中类别层面进行数据比较,但区域经济的梯度转移趋势已在整体上基本显现,这也为下一步的细化分析提供了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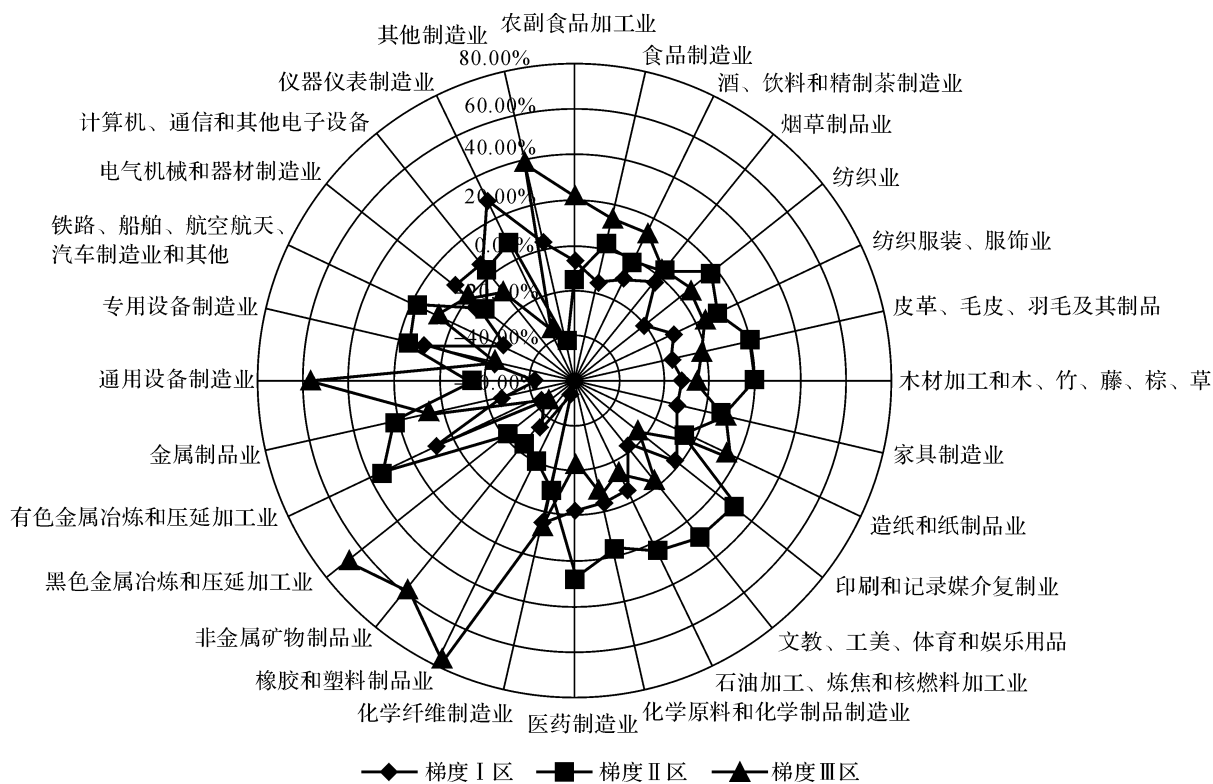


图1 2003~2013年全国三大梯度区制造业转移情况^①

(二) 产业梯度转移的模型、变量和数据

1. 产业梯度转移回归模型。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学界关于构建产业转移模型的尝试不少。多元回归模型的构建是学界的常用方法。除模型中关于如何测量产业转移方法不同外,自变量的选择大同小异,主要区别是其被解释的方法。类似地,本文倾向于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对区域经济的产业梯度转移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与学界的主要研究进行比较,以此发现各个因子的影响大小,重点考察产业梯度、空间可达性、产业基础、要素成本和对外开放等因素在产业转移中的影响,具体的研究模型如下:

$$Y = (\alpha X_{cylt} + \beta X_{ijkl} + \delta X_{cyjc} + \varepsilon X_{yscb} + \gamma X_{sckf} + \mu) \quad (2)$$

其中, Y 表示各地区的相对产业转移量, X 为系列自变量,其他字母为常数项、变量系数和误差项。

2. 影响因子选取和数据构成。本文主要研究产业梯度、空间可达性、产业基础、要素成本和市场开放程度对产业梯度转移的影响,分别表示为 X_{cylt} 、 X_{ijkl} 、 X_{cyjc} 、 X_{yscb} 和 X_{sckf} 。为便于测算,本文着重对上述变量的重要特征进行反映,如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解释产业梯度变量、地区货运量占全国的比重解释经济空间可达性、当地相应行业占全国行业产值比重表示区域经济的产业基础、当地相应行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表示要素成本变量、外商投资占当地相应行业总产值比重表示地区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数据主要来自2003和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选取各地区176个行业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5000多个细化数据。回归模型侧重对30个省

^① 限于篇幅,文中仅列出28个行业大类产业相对份额转移情况,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统计数据库和各省(市)统计年鉴。

(市)的产业转移情况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则重点对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予以细化数据验证时,区域经济数据的选取口径缩小并细化到地市级城市。

(三)回归结果的简要分析

前文针对全国 30 个省(市)的 28 个行业大类 2003 ~ 2013 年的分梯度相对产业转移量进行了较为宏观的分析,并指出产业的显著梯度转移趋势。实证部分将依此进一步分析产业转移的条件,并在回归模型“逐步”分析部分着重研究产业梯度、经济可达性和产业基础等因素对处于梯度Ⅱ和Ⅲ区的 25 个省(市)的产业转移产生的影响(相关结果见表 2 所示)。为确保拟合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进一步对每组变量中的极端数据进行一般化处理(极端大值乘以 120% 或极端小值乘以 80%)后再重新估计,估计结果仍然稳健。另外,通过对比回归结果中 R^2 、DW 值等数据,我们发现模型具有强拟合性,变量之间的自相关性弱。

表 2 回归模型的系数和验证参数

模 型	系数 α	系数 β	系数 ε	系数 δ	系数 γ	调整后的 R^2	DW 值
step1	1.428 ** (5.056)	1.728 ** (5.056)				0.968	2.073
step2	1.796 ** (7.232)	1.596 ** (7.232)	1.039 * (4.227)			0.976	2.197
step3	1.013 ** (5.198)	1.113 (5.198)	0.929 ** (3.668)	-0.377 (1.006)		0.967	1.857
Step4	1.287 ** (4.261)	1.187 ** (4.261)	0.739 (1.541)	-0.125 (0.588)	0.242 (0.325)	0.789	2.528

注:括号中数字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除要素成本与区域产业梯度转移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外,其他因素均与产业梯度转移之间呈现较强的正相关性,这与假设 2 整体上相吻合。其中,产业梯度、经济可达性对梯度Ⅰ区之外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整体影响最大,产业基础、对外开放和要素成本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次之。总体看来,区域产业转移具有很强的梯度转移特征,且越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越遵循梯度转移规律,如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行业大类中的行业。区域产业转移的这一特征与国际产业转移顺梯度转移趋势总体一致。与国际产业转移并非漫无目的地在后发地区选择产业转移受体一样,区域产业转移的方向和规模在很大程度上还受产业基础、要素成本和区位优势的影响。实证结果初步显示,即使在产业梯度大致相同的地区,低梯度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也厚薄不一,产业梯度基本一致的江西、四川和安徽等Ⅲ区的省(市)及辽宁、福建和山东等Ⅱ区的省(市)因经济区位和产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而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在相应梯度地区分别拥有更多的产业份额。关于要素成本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比较明显的趋势是橡胶制造、塑料制造、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和方便食品制造等劳动及资源密集型产业正加速向低梯度地区转移。在对外开放方面,与外商投资对早期沿海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作用一样,其对低梯度地区承接区域产业转移也产生积极影响,如因特尔、惠普、联合利华和富士康等公司在转移过程中加速向成都和重庆等地区转移产能。

正如回归模型中验证的那样,对发展非均衡的区域经济来说,沿梯度依次转移是区域产业转移的重要空间特征和转移趋势。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发展先发地区虽在整体上居于全国经济的领头雁位置,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先发地区内部发展也呈现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特征。产业转移主要来自高梯度地区,但承接地除域外低梯度地区,还有可能是域内的相对低梯度地区。因为域内城市间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其在产业转移中的地位比较特殊,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地方。

四、对长三角产业转移的细化数据验证

为进一步了解区域产业转移的方向、规模和趋势形成,除上述较为宏观的产业转移分析外,本

文还将结合身处梯度Ⅰ区的长三角的域内产业转移对其展开细化数据验证^①。首先根据2010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长三角33个地市级城市的产业梯度进行大致划分(结果见表3所示)。以此作为长三角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梯度划分基础,我们进一步对2003~2013年长三角的产业转移情况予以细化分析,并将其与全国范围的产业梯度转移数据进行对比(见表4所示)^②,以更深入、细化地了解区域产业梯度转移的空间、时序和结构特征。

表3 2010年长三角域内城市梯度划分

经济区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域内城市分布
域内梯度Ⅰ区	60000元以上	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宁波、南京、镇江、嘉兴、绍兴
域内梯度Ⅱ区	30000~60000元	合肥、芜湖、马鞍山、扬州、泰州、南通、金华、台州、温州、铜陵
域内梯度Ⅲ区	30000元以下	徐州、连云港、盐城、淮安、滁州、淮南、丽水、宿迁、巢湖、亳州、阜阳、宿州、蚌埠、六安

表4 2003~2013年长三角地区与全国产业梯度转移情况对比

单位:%

行 业	长三角地区域内产业梯度转移量			全国产业梯度转移量		
	Ⅰ区	Ⅱ区	Ⅲ区	Ⅰ区	Ⅱ区	Ⅲ区
塑料制品	-28.92	-7.21	2.78	-47.22	-12.11	49.33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25.42	6.17	4.11	-31.78	12.45	19.33
饮料制造	-24.11	2.27	3.77	-30.21	21.37	8.84
通用零部件制造	-24.03	15.77	5.29	-29.27	9.83	19.44
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22.29	-3.21	4.76	-33.21	19.23	13.97
玻璃制品制造	-19.88	4.22	3.95	-29.01	11.22	17.79
焙烤食品制造	-18.91	1.51	5.13	-28.31	-5.71	34.02
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17.87	-3.54	8.66	-27.54	2.01	25.43
方便食品制造	-17.41	9.44	7.29	-28.93	18.37	10.56
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16.37	11.22	4.84	-24.33	17.45	6.88
专用仪器仪表制造	4.79	-0.28	-2.94	7.11	2.54	-9.65
电子和电气机械专用设备制造	3.12	1.36	-1.18	6.89	1.03	-5.72
计算机制造	3.07	0.53	-1.07	6.21	1.73	-5.94

注:篇幅所限,表中仅列出长三角地区产业梯度转移量最大的10个行业和集聚趋势最明显的3个行业,并与全国的产业梯度转移量进行比较。

(一)空间特征:在经济空间上由高到低梯度转移,在地理空间上由中心到外围渐次扩散

上述产业梯度转移回归模型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和验证,发现产业梯度和经济可达性都是区域产业转移的重要影响变量,这一结论在对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分析中进一步显现。一方面,经济空间上产业“从高梯度向低梯度转移”的特征明显。例如,通用零部件制造业,从梯度Ⅰ区转移出来的产业,产业Ⅱ区承接量明显多于Ⅲ区;塑料制品业,梯度Ⅰ、Ⅱ区的产业转移量都是负的,只有梯度Ⅲ区转移量是正的,说明处于经济空间的梯度Ⅲ区是梯度Ⅰ、Ⅱ区中属于边际产业的塑料制品业的主要承接地。另一方面,地理空间上产业转移的“从中心向外围渐次扩散”的特征在长三角与全国的数据对比中凸显出来。受经济可达性影响,长三角地区处于全国经济的相对中心位置,域内的产业转移具有明显的地理上的毗邻性,即域内转移强于域外转移。此外,在方

① 在长三角地区,只有上海、江苏和浙江整体上属于全国范围的梯度Ⅰ区,因安徽的合肥、芜湖和马鞍山与中心区的经济联系紧密,故将其一并纳入分析框架。

② 由于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和浙江整体上处于全国范围的梯度Ⅰ区,但将江苏、浙江两省的数据细化到地市级单位时,其产业梯度的范围则扩展到Ⅰ、Ⅱ区。考虑到长三角域内Ⅲ区主要是安徽省内的城市(除合肥、芜湖和马鞍山外),长三角地区域内Ⅰ、Ⅱ区的转移量是长三角地区对全国Ⅰ区的某一行业产业转移的贡献,如塑料制品业全国Ⅰ区-47%的转移量有近36%来自长三角域内Ⅰ、Ⅱ区的转移。

便食品制造业、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业中,长三角域内Ⅱ、Ⅲ区基本吸纳了域内Ⅰ区的转移产业(需要强调的是,除安徽省部分相对后发城市外,长三角地区的大多数城市处于梯度Ⅱ区以上),这也说明处于同一梯度的域内地区因与产业转移地有更强的经济联系而在区域产业梯度转移中占有更多份额。

(二) 时序特征:劳动密集型产业先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

在表4中,产业转移量最大的10个行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心或高梯度地区的最大转移幅度接近40%。这类产业往往在早期就已在中心或高梯度地区完成产业成熟期,并于2003~2013年进入最大转移阶段。区域产业梯度转移并非同时发生,有时会呈现错位转移。总体趋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较早,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较晚。数据显示,2008年前后是区域产业转移的重要节点。为进一步了解产业转移的时序性特征,我们选取2008年的产业中类截面数据对2003~2013年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数据进行分割,结果发现大多数产业的转移主要发生在2008年之前,其中的典型代表是长三角的纺织服装制造业,转移较早且其域外转移趋势明显;高梯度地区的农副食品加工和食品制造类产业在2008年之前已转移完毕,产业份额基本稳定在满足本地市场需求水平;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在2008年之前一直向高梯度地区集中,直至2008年前后才逐渐呈现外移端倪。

(三) 结构特征: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差距收窄趋势,产业结构总体进入上升通道

2003~2013年长三角地区产业梯度转移趋势明显,全国范围的边际产业也呈现明显的梯度转移趋势。域内、域外不同梯度之间的这种产业互动的直接结果是边际产业在高梯度地区相对份额缩小,并在低梯度地区实现扩张。此消彼长之间,低梯度地区相继实现工业总产值的绝对增加,并进一步贡献当地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高低梯度之间的发展差距呈现不断收窄趋势。同样地,高梯度地区的产业结构也在产业互动中实现了升级。从表4中可以看出,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规模从诸如长三角之类的高梯度地区渐次抽离,高附加值产业在产业转移中呈现“逆梯度聚集”的现象。一方面,这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和专用设备制造等资本-技术集中产业在区域内的规模化集聚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低梯度地区的企业逐步将自己的研发中心、营销中心和公司总部转移至中心城市的结果^[11]。正是这种逆向转移或集聚主导了高梯度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趋势,高梯度地区制造业附加值比重也因此在全球价值链中呈现明显扩大趋势。

五、结论与启示

以2003~2013年全国范围的产业梯度转移回归模型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产业梯度是影响产业转移的第一变量。自2003年以来,产业梯度转移在全国和区域范围内颇为明显。然而,即使高梯度地区的边际产业已开始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但长三角等高梯度地区仍是转移产业的优势集聚地(域内制造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从2003年的64%降至2013年的49%)^①。另外,本文特别将钱纳里的发展阶段区分标准引入区域梯度划分过程,并以此为基础对比了作为全国范围产业转移重要转出地的长三角地区与进一步细化的长三角地区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域内重要转出地的具体转移情况,结果发现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首先从域内产业高地向域内次高地转移,再顺次向域外低梯度地区转移,对劳动力和原料成本更为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目标相对分散,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转移节点是2008年。

2003~2013年全国范围和长三角地区的产业互动的重要特征是产业的梯度转移,且域内地区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和2013年制造业数据计算而得。

的产业转移强于域外地区。因此,长三角等经济发展先发地区在实施产业转移战略时,应基于对域内地区运输时空成本和产业承接能力等因素的考量,相对优先地引导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域内地区转移,以尽量减少产业转移过程中的规模损失,促进长三角等高梯度地区在整体上实现工业化后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的全面工业化。另外,在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三大高梯度地区可逐步渐次利用区域经济联系,将区域产业转移的空间范围拓展至京津冀—华北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珠江—西江经济带等,通过扩大高梯度地区扩散空间范围的方式减少区域产业转移粘性。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可立足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积极构建域内产业高地。依据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及“一带一路”战略,成渝和中原等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可进一步通过深化市场开放、强化政策安排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筑巢引凤”,实现区域经济资源向中心地区集聚,为随后域内高地的产业梯度转移积蓄扩散势能。

参考文献:

- [1] Akamatsu K. A Theory of Unbalanced Gr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 [J].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961, (86): 196–217.
- [2] Vernon 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6, (80): 190–207.
- [3] 刘志彪. 全面深化改革: 基于纵横两条基本路径的战略思考 [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4, (5): 54–60.
- [4] 陈建军. 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演变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3): 89–98.
- [5] 杨亚平, 周泳宏. 成本上升、产业转移与结构升级——基于全国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3, (7): 147–156.
- [6] 陈刚, 刘珊珊. 产业转移理论研究: 现状与展望 [J]. 当代财经, 2006, (10): 91–95.
- [7] 刘红光, 王云平, 季璐. 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特征、机理与模式研究 [J]. 经济地理, 2014, (1): 102–107.
- [8] 胡安俊, 孙久文. 中国制造业转移的机制、次序和空间模式 [J]. 经济学(季刊), 2013, (3): 1533–1566.
- [9] [美] 霍利斯·钱纳里著, 李斯华等译. 发展的型式(1950–1970)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
- [10] 刘志彪, 张少军. 中国地区差距及其纠偏: 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视角 [J]. 学术月刊, 2008, (5): 49–55.
- [11] 张公嵬. 我国产业集聚的变迁与产业转移的可行性研究 [J]. 经济地理, 2010, (10): 1670–1674.

Cross-regional Gradient Transfer or Regionally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 Analysis of Industrial Transfer Based on the Data in China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Partition from 2003 ~ 2013

ZHANG Mingzhi, XIE Hao

(Marxism Institute, Nanjing Political Institute of PLA,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 The results of a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low gradient areas in 2003 ~ 2013 show that industrial gradient is the first variable of influence in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industrial gradient transfer of economic space is the primary trend of the industrial and regional interaction.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dicates the following: in terms of space, the marginal industries of regional transfer is stronger than the extraterritorial transfer between the same gradient areas; in terms of timing,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transfer is earlier than capital-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erms of structure, both the high and low gradient areas come into the rising chann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due to the regionally industrial transfer. In this regard, the high gradient areas should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transfer in the domain of industrial space by gradually expanding regional economic link, while the low gradient areas should accumulate potential energy to transfer the industries to lower gradient within the region by constructing local industrial highland.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ndustrial Gradient

(责任编辑: 化 木)